

##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 研究方法与创新

冯绍雷 李中海 张 昕 郑春荣 严安林 孙建中  
余南平 石晨霞 王 健 余建华 门 镜 臧术美

**【编者按】**2021年5月,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指导下,《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联合《国际展望》《国际观察》《国际关系研究》《德国研究》编辑部,就“新发展格局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举行学术研讨会。我们选取了部分发言专家的文稿,组成本期笔谈(根据发言的内容,从一般理论到国别研究案例排列),以飨读者。当前国别与区域研究事关重大,因为中国的事情历来很大程度上与如何理性地把握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国正在从梁启超笔下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迈向“世界之中国”,现在可能是历史上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第一次尝试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甚至包括南北极、外太空等)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之中国”急需建立能够覆盖全球各个地理空间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同时也日益迫切地需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立足中国、讲好世界故事”。崛起中的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深,对于世界各个地区的关切和了解的需求就越大。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上述过程提供知识储备责无旁贷。

**【关键词】**区域与国别研究 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 国家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146(39)

## 学习《论持久战》“三阶段”战略预判， 研究中国长时段的内部发展与对外战略

冯绍雷\*

毛主席对于抗日战争中“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阶段”预判，<sup>①</sup>不光为历史成就所证明，而且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

首先，就我国当前阶段对外关系而言，虽然并不完全是“敌强我弱”，但是在并未取得对美国主导的西方总体优势的局面下，将其视为一个类似于“战略防御”或者“防守反击”的态势，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为“大国关系的调整期”，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战略表面上来势汹汹，但事实上实力对比今非昔比，拉帮结派而漏洞百出，以“民主与专制”作为思想政治工具也捉襟见肘。这一“调整阶段”至少持续到 2024 年，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不光美国、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地区等届时将要面临 2024 年选举，这些国家与地区的选举将产生巨大而难以估量的“外溢”效应，同时，这也将是疫情后国际政治经济重组的一个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多项国际预测表明，今后的若干年，将会是中国 GDP 总量超过美国的敏感时段。如果我们在这一“防守反击”的战略阶段能站稳脚跟，对以后的长期发展做好通盘筹划，那么中国以一个稳健进取、和平开明的发展中大国姿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博弈，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此后，一个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与西方阵营长期持续的较量阶段，将真正拉开序幕。

类似于《论持久战》中“战略相持阶段”，在中美这两大对手之间，总体而言，美国实力依然占先，但又各有优长，因此长期相持胶着的艰难博弈难以避免。在这一阶段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表明，哪一个大国能够抓住机遇，有效地推进国内体制改革，它就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以美国为例，面临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罗斯福新

---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39-518 页。

政问世，而凯恩斯本人则甚至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想。<sup>①</sup>新政大刀阔斧改革内部弊病，使美国国力大增，通过赢得二战胜利，最终一举成为世界霸主。同样是美国，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滞胀、越战、内部政治危机之后，70 年代末里根推出新保守主义改革，以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掀动新一轮全球化，借势瓦解苏联，主导了 90 年代后整整几十年的世界潮流。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苏联虽有改革雄心，但一再错失机会，在为时过晚的局面下，已无力挽潮流于既倒，终于落得大国解体。大国内部改革未必要以称霸为归宿，但客观上对于激烈竞争中大国地位的沉浮，起着关键作用。

“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博弈，是否坚持以改革内政为优先，实际上不光为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所证实，而且也将是我党一系列既定路线的必然延伸：（1）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方针，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主导内外发展。内循环必须以全方位内部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辅佐。（2）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模式与治理能力的实现，理应是“战略相持阶段”一个极其关键的战略目标。没有真正的“自我革命”，就不可能实现这一阶段的全胜。（3）至于 2035 年实现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目前计算，需要这一阶段年均增长 4.75% 的发展水平。要达到这一水平，没有真正的体制改革，激发各类要素增长，盘活整个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进一步言之，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内部体制改革，已不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欧美为导向的模式，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基础、积累与国际先进思想和经验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强调推行改革的稳固的政治基础，以及改革的有效务实，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样背景下的对外开放，也是扎紧篱笆之后的打开大门。有充分理由可以预期，经过“战略相持阶段”长期而深入的改革，中国国际地位与实力的提升，乃是大势所趋。

最后，与《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战略反攻阶段”相类似，中美较量是否会导致像中日战争一胜一败这样一种历史结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未来大国博弈的战略估量，而且也将是未来世界走向

---

① [英]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的哲学与道义取向的一次跨世纪考量。笔者曾多次提出，未来国际秩序构建可用世界秩序历次更替的经验作为铺垫。尤其是，可以 1814-1815 年维也纳体制为参照。理由在于，这一体制导致了恩格斯所说的“百年和平”的实现。尽管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有过若干战争，但是百年间并未发生过全面的欧洲战争。微妙之处在于，维也纳体制并非所谓“民主和平论”的实现。相反，作为维也纳体制主角的英国、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王国，都是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君主立宪或专制体制，而并非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换言之，内政的体制差异不应该成为国际和平的障碍。值得关注的是，近日来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外交学会主席哈斯、资深学者库普乾居然也公开署文，明确主张以维也纳体制作为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楷模。他们叙述的重点，不光是同意国内体制差异不应该成为大国协同的羁绊，而且从技术层面提出了维也纳体制各国间的中立、协商、互相尊重，应该是大国交往之道。<sup>①</sup>此文既出，一时争议四起，恰好说明这一问题乃是当前国际转型的一个关键聚焦。可以说，“战略反攻阶段”的前景，不光取决于力量对比，而尤其在于以怎样的模式与制度构想引领天下。究竟是以胜负决断式的预判，还是以大国协同式的模态去掀动潮流，效果必定是大不一样的。

作一个简短的总结：第一，中美博弈的开局，十分重要。路径选择往往决定了事后的发展。立足于“战略防御”或“防守反击”的姿态，不光为了战术上伸张有度，也为长期发展战略留下余地。第二，“战略相持阶段”的内政改革乃是成功的关键，这已为内外经验和已有认知积累所铺垫。“自我革命”是不忘初心的一個成功保障。第三，决胜和反攻阶段的制度模式选择，事关重大。往往不是实际上难以测量的实力决定一切，而是思想与道义的高度在左右人心，创造奇迹。

在这样背景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事关重大。因为，中国的事情历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性地把握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曾经说过旧世界已经老去，但新世界尚未来到。首先的问题是，旧世界如何老去，留下了哪些遗

---

<sup>①</sup> Richard N. Haass,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3-23/new-concert-powers>

产，该做怎样的清理？其次的问题是，新世界何时会到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世界才会到来，新世界将会以怎样不同于旧日的方式而兴起？为什么我们会尤其关注俄罗斯，因为在俄罗斯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一身而二任的禀赋，即，它曾经是新世界的缔造者，但同时也带有浓重旧世界的印痕。我们能从中取得怎样的教益呢？有待大家十分的努力。

## 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特点及发展方向的思考

李中海\*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日趋活跃，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方法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更多关注。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杂志曾组织系列文章，邀请优秀青年学者从“三大体系”建设的高度和学科发展角度，对40年来中国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也主持出版了《国外俄苏研究》系列丛书，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领域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趋于活跃。应该看到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与40年前相比已取得显著进步，这一领域学者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成果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不应忽视的是，这一领域的总体研究状况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这一判断同样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实际情况。笔者作为学术期刊负责人，在多年办刊实践中也感觉到，目前期刊收到的投稿也存在科学性、理论性和原创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使区域国别研究向精深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向精深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从社会科学的高度认识区域国别研究。换言之，应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看待。

---

\*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执行主编。

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被赋予了智库、外宣等多种职能。不可否认，区域国别研究要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服务于外交工作，相关学者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表看法，对外交工作建言献策，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是应有别于政府智库、外交和新闻机构。从社会科学的高度，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来研究、阐释世界，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独特优势，也是其首要任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三大体系”建设还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抑或提升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增强国际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科学意识都是第一要务。

其次，要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从特殊性角度研究区域国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sup>①</sup>目前很多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或其他不同类型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对这些理论必须进行适用性检验，否则，盲目奉行“拿来主义”，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区域国别研究，不但无法解释具体区域和国别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需要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认识论根基，“不要用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

再者，区域国别研究要增强学科意识，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所谓增强学科意识，并不是说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发展，都不大可能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一般性学科相提并论的门类，但是区域国别研究要

---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社，2016年5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4.html>

使用现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工具。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人文传统和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中需要解释的问题和现象杂多，需要借鉴现有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和研究工具，对复杂问题进行合乎逻辑秩序的梳理和阐释。关键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式的过程描述。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sup>①</sup>另外，应对研究的选题进行充分概念化，以概念为基础对特殊性问题进行一般化处理，从而在学理高度阐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轨迹和可能趋势。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转型，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世界各国和地区也正在经历复杂的变化，亟须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概括和阐释，区域国别研究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存在问题的评价，可以发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为使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向精深发展，可能需要抓住几个着力点。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柱和生命力在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根本在于科学意识和学科意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问题研究既是经验性学科，也是规范性学科，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对外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是区域国别研究者应尽的义务。但是同时应该认识到，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探析和阐释研究对象的根本特点和实际情况，为此需要作艰苦细致的基础性研究，相关

---

<sup>①</sup>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部门应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应该看到，不少区域国别研究单位都面临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一些机构挂牌很多，但学术成果很少。专业研究人员短缺是主要制约因素。同时还存在人才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人才紧缺，另一方面是相关专业博士面临就业难问题。此外，在博士培养阶段还存在科学思维训练不够、论文写作基础训练不足等突出问题，尤其是写作能力的培养存在很大欠缺。

三是为学术成果的展示提供更多平台。区域国别研究中既有理论研究，也有现实问题研究，既有大国研究，也有小国研究，既有热门问题研究，也有冷门问题研究。目前，小国研究、冷门方向研究面临着成果难以发表的突出问题。学术期刊部分承担着学术成果展示、交流和学术批评的职能，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作用，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 以知识生产为核心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张 昕\*

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来看会议标题中的“新发展格局”，我理解最相关的是两层意义：首先，当下的中国正在从梁启超笔下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迈向“世界之中国”，现在可能是历史上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第一次尝试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甚至包括南北极、外太空等）。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之中国”急需建立能够覆盖全球各个地理空间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这是我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则是，我们同时也日益迫切地需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立足中国、讲好世界故事”。崛起中的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深，对于世界各个地区的关切和了解的冲动就越大，而国别区域研究作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上述过程提供知识储备责无旁贷。

---

\* 张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出于现实的政策需求，已经对区域国别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特定领域的投入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这个领域的大国美国。过去几年，学界多有提升国别区域研究专业地位的努力，部分高校已经成立专门的国别区域研究、教学单位，大量专门以国别区域研究议程为主题的会议也不断召开。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来说，当下的中国的确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作为舆情搜集基础上创造、传承、积累知识、培育人才的体系仍难当其责。现实的巨大需求和这个领域里“国家知识体系”的供给能力之间仍有巨大差距。这个落差与历史积累的欠缺有关，也与当下国家知识体系背后的组织方式、激励机制有关。

在更抽象的层面，也需要认识到：知识生产本身是一个国家“国民政治经济体系”或者“国家-社会-市场”综合体的一部分，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国民政治经济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知识生产体系。知识生产本身又始终在政治与行政场域、经济场域、制度化文化生产场域和媒体场域之间的缝隙中游走，寻找、争取自己的合法性和价值，而知识生产本身也可能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力场域。此外，在当下全球性的传统知识生产体系式微、进入一个“专家已死、真相何在”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认识知识生产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建设中的中国国别区域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也无法置身其外。

在此过程中，作为以特定区域为主要关注对象和界定学刊基本属性的《俄罗斯研究》，近几年的实践，也是希望推进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和促进培育相应的学术共同体。具体而言，《俄罗斯研究》尝试鼓励和推动有鲜明学科基础和学科问题意识的研究，减少单纯针对热点问题的舆情报告、情况介绍、政策注解和口号式的研究；推进和鼓励多个层次上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超越单纯的以国家为单位、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研究；加强国别研究与主要学科领域的对话和知识积累（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和历史），在向其他学科提供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区域国别知识的同时，希望逐渐推动本领域对于传统学科的反哺。这方面区域国别类学刊和传统学科领域的学刊之间有增加合作的重要价值和空间。

除了以学刊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体系，我们也日益面临新的知识传播环境带来的挑战——这也正是所谓“专家已死、真相何在”时代的重要背景。由

此,我们也希望尝试在宣传和推广上学习和利用各种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和方式,将“征稿-投稿-审稿-修改-发表-发表后推介”这个围绕学刊的知识生产传播全过程通盘考虑,为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共同体做出新的尝试。我们已经建立了《俄罗斯研究》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但是公众号转载长篇学术论文的传播效果还是有限。因此今后我们可能考虑的方式还包括:在专门的学术论文基础上,适当增加对谈、圆桌讨论等更为活泼、更注重交流性质的内容提供;尝试对学刊的作者进行采访、提供论文文字之外的音频(播客)或者视频内容、增加作者和读者的互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推出本学刊相关主题历年发表论文的“微专辑”,专门推送以加强传播效果;与其他学刊、媒体、智库、媒介平台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学刊论文和论文作者的影响力。当然,这些可能的尝试在以引用率为核心的学刊评价体系中是否能够起到正面作用,我们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此外,目前中国学者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除了跟中国有直接关联的议题,在中国以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这方面不能陷入僵化理解“内循环”的误区。对此,我们也希望利用《俄罗斯研究》这样的小小平台,能更多对外推广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欧亚地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与中国未必有直接关联的),推介到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甚至更广的学术研究群体中去。通过和国外学术群体、学刊的合作,我们也希望推动中国学者更多加入国外相关领域学刊的审稿和编辑工作,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推广中国学者的声音、理念和研究成果,实现学术研究、知识生产领域“内外循环”的和谐统一。这应该也是“立足中国、讲好世界故事”的内在需要。

##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改进思考\*

郑春荣\*\*

当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准确把握区域与国别形势变化、科学应对错综复杂的国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0VGQ011)的阶段性成果。

\*\*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能力，助力“于危机中谋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目标。

### （一）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着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化问题。学界普遍的共识是，区域和国别研究涉及一个区域和国别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这决定了它是一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但是，对于以哪一个学科为主的问题，学界则有不同认识，例如，历史学、政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分别强调各自的学科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尤其是外国语院校近年来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纷纷设置了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向的二级学科。但是，这样的设置并未解决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一级学科》简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需要“借用”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正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尚）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因此，目前它也难以被设立为独立的一级学科。

2.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往往专注于单个国别、单个区域的精细化研究，这样的深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相关区域与国别事件的内部根由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忽视国际大环境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而且，在研究的进路上，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偏见，例如国际关系学科倾向于从上至下的研究视角，重国际大势、轻区域与国别的特殊性，而外语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则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棱镜，往往缺乏对全球格局的关注。

3.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立场主体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对于研究对象区域和国别有着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往往有着研究对象区域与国别某个问题的自驱动力，尤其外语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国外的知识和情况富有好奇心、敏感性。但是，与此相对，他们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学习领会却相对不足，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认为，这是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任务。由于这样的认知偏差，使得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时常不能从

中国发展的需求出发展开区域与国别研究,而且也无法履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职责与使命。

4. 区域与国别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常年来从事的都是基础研究,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天然具有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属性。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常常割裂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认为后者是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内容,而非高校一般研究人员的职责,这在本质上与咨政成果大多未纳入职称评审和业绩评估体系有关。如果割裂看待区域与国别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则会使二者成为“两张皮”,无法发挥它们之间的融合联动。

## (二) 加强和改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思考

一是要提高站位,从服务党的治国理政的高度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绝不应只是研究人员的“自娱自乐”,而是有着鲜明的使命导向。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勃兴,得益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理应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以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二是应按照交叉学科设置区域与国别研究。如果选择在某个现有学科下设置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向,很容易陷入单一学科的窠臼,不利于多学科协同、跨学科深入。既然区域与国别研究涉及的是某个区域与国别的整体性知识体系,<sup>①</sup>考虑到区域与国别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其设置为交叉学科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样的设置可以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各学科之间“搭桥”的作用,实现多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协同,也有利于未来发展成熟,形成“区域与国别学”这样综合性的理论与方法。

三是应秉持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可从某个国别深入,延伸到区域,再扩展到全球维度,即从点到面再到立体;同时,看问题的视角不应是单向的,而是也需要基于国际大局观、

---

<sup>①</sup> 罗林、邵玉琢:“国别和区域研究须打破学科壁垒——论人文向度下的整体观”,《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7-165页。

向下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视角。这也就要求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不应只是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国别通”“区域通”，也应是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全球通”。

四是应将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两种视角统筹起来。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应坚持看问题的中国立场和视角，这并非是在倡导“中国中心主义”，而是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外语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容易盲目地以为对象国或区域的当地知识就是准确的、权威的。因此，应避免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先入之见，保持清醒性和批判性。我们应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角思考研究选题，把握好世情与国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在当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还有一个使命是“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正如习总书记近日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的，“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sup>①</sup>

五是要坚持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不仅是指区域与国别研究应努力做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辅相成，尤其是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在服务国家决策需求上尚缺乏自觉意识，选题的敏感度也有不足，为此，需要与实务部门加强沟通，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需求。事实上，长期的“冷门”研究与短期的“热点”研究并非相互无涉，相反，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素材和方法上的支撑，而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现实关切。而且，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除了要增强对单个国别和区域的深入研究，比如通过加强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或者通过建立国别和区域相关数据库，并利用大数据展开研究，还应加强跨国别、跨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包括地区内比较、地区间比较和跨地区比较这三种亚形态，找出国别与区域之间的异同点或趋同趋异的影响因素，助力我国对外政策的精准发力。

---

<sup>①</sup>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求是网，2021年5月10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5/10/c\\_1127428545.htm](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5/10/c_1127428545.htm)

## 正确处理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五对关系

严安林\*

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大户”，一向受到学者们较大的关注与重视。近几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再度被各方所“青睐”，从在机构设置、资源投入与学术产出等方面硕果累累。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做好区域国别研究，怎样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在此提出需要处理好，或者是平衡好的五对关系。

第一对关系是“区域”与“国别”的关系。即“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关系，也是研究范围的“大”与“小”的关系。“国别研究”应该是“区域研究”的基础，如果只关注“区域研究”，不重视“国别研究”，可能出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问题，研究工作会浮于“大”、流于“粗”，而不够具体、不够细致。但如果一味重视“国别研究”而忽视“区域研究”，则可能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许多研究者对于某一国别可能研究得很深、很细，但如果只限于“国别研究”，可能会出现站位不高、格局不足的问题，最终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以个人所从事的“台湾研究”或“两岸关系研究”为例，也时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可能因为过于重视甚至是局限于台湾岛内局势的分析，甚至对岛内情况如数家珍，如对于国民党与民进党关系、政党政治等着墨很深，但如果忽视外界对于台湾地区的影响，就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而台湾地区，历来是“四战之地”，深受外界多方面影响，不仅与美国，而且与日本的联系密切，影响久远而深刻。亚太地区局势的演变对于台湾岛内政治势力的影响不小。

第二对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的关系。即“区域”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当然需要重视区域国别内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更需要重视影响区域的外部世界的因素。研究视野必须扩大到周边与全球，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全球一体化，“区域国别”与世界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当然，“区域国别”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小，而世界局势的发展对“区域国别”的影响更是不容低估。还是以台湾地

---

\*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区为例，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影响不小，而世界的发展又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包括最近国民党的变化，进一步地“本土化”，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等，都是值得深究的。这实际上也是需要处理好“区域国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对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与“专业领域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各方一贯比较重视与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各高校成立许多的研究机构，教育部设立许多的研究基地都是侧重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近若干年来各方开始比较强调“专业领域研究”，成立了不少的世界经济所、全球治理所、国际战略所、外交政策所等专业性质的研究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化“专业领域研究”之后，“区域国别研究”事实上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据王逸舟在《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发表的“外交知识刍议”一文统计，2019-2021年这三年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课题指南的263个课题中，有49%的课题是与高层政治、中央外交方略直接有关；有关美国的题目40个，占15%；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题目28个，占10%左右。<sup>①</sup>显然，“区域国别研究”的比例不高，至少在数量上并没有随着“专业领域研究”的大发展而同步增加。现在人们再度呼吁重视“区域国别研究”，这是大好事。“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专业领域研究”的基础。需要在机构设置等体制、机制上给予“区域国别研究”充分的保障，也需要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中给予应有的保障。当然，各相关科研机构的考核指标也是重要指挥棒。包括相关的智库，既要根据形势与政策需要强化内参建设，也不能忽视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认可，甚至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同时给予内参成果、领导批示与学术论文等基础研究的认可。

第四对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区域国别研究”较大的一个特点是“跨学科”的性质，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所研究地区或者对象国别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对各方面情况的“专业学科”研究得好，对于“区域国别研究”一定是相当大的助益，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与深化。以香港研究为例，如果对于香港

---

① 王逸舟：“外交知识刍议”，《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第5页。

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问题，在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方面的研究都做得非常好，相当程度上就是做好了香港研究。

第五对关系是学术、理论等“基础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之间的关系，即“基础研究”与“咨政研究”之间的关系。“基础研究”最终也是需要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但不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类似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是难以做好的，因此需要重视“基础研究”，不可偏废“基础研究”。但如果只有“基础研究”，只做“基础研究”，不转化为“决策咨询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应该也是不完美的。当然，其中需要打通专家学者的“基础研究”如何服务“决策咨政”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推动“学术研究”与“咨政研究”的有机融合。当前，上海与全国的各类高校和研究机构拥有多学科、宽领域、强基础的优势，承担着国家和上海许多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的重大研究任务，但毋庸讳言，事实上依然存在不少不能及时将重要“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在“学术研究”与“咨政研究”方面存在“两张皮”、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等问题，包括需要做好内参文风的转换，不是只用学术语言，而是用决策与职能部门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表达。

以上是个人提出的区域国别研究中需要平衡好的五方面关系。当然，其他需要处理好的关系还有不少，如“政治经济研究”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研究”之间的关系，“语言”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虽然情感不能代替现实，但现实有时会被情感所左右，或是受到情感的影响。

##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范式

孙建中\*

全球、区域与国别是三个不同的集体单位（units），属于三个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层次（levels），都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在，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并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来对待，

---

\* 孙建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观察》副主编，教授。

旨在通过对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为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服务，最终都是为我们当前的外交政策与战略以及长远的国家利益服务。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在内容上要突出其对我的信息或情报价值，在方法上要突出其对我获取有价值信息或情报的有效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 （一）关于新发展格局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美国创立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这一门独立的学科，“苏联学”是其研究主题和核心内容；其基本定义是研究如何满足美国的军事竞争和海外行政管理需求的一门学问，因而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存在密切关系；其基本特点是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战略情报服务甚至提供战略情报。正因为如此，国家、情报机构和基金会是为这一研究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应当说，美国的“区域研究”为其赢得冷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未来不排除该学科在美国遏制中国大背景下复兴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当对当今美国“区域研究”的方法和范式及其创新和发展趋势加以关注，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为我所用，进而为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创新提供铺垫。

现在，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是：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树立了新发展理念，确定了新发展格局目标。所谓新发展格局，就是指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其目的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可持续力。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不仅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是一种战略抉择，对于我对外经济合作与竞争也是一种战略抉择。因此，新发展格局也是未来指导我对外战略的指针。

在此背景下，探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必须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不能抛开定性研究而纯粹地进行定量研究，在重要的研究课题上更是如此，因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的涉外研究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大战略，必须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现实问题，我们应抱着“实然”（to be）的态度；对于理想的问题，应抱着“应然”（ought to be）的态

度。两者不能混淆。也就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尤其是要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具体问题，并在需要时就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 （二）关于新发展格局与研究方法和视角创新

既然构成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是以国内循环系统为主，目的是让中国摆脱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从而让美西方国家失去通过经济制裁手段牵制和打压中国的基础，那么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必须围绕着为构建更具活力和可持续力的国内循环服务来开展。

一是周边海陆邻国是我构建国内循环的主要外部依托。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定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相比较地理上遥远的国家和地区，我周边邻国和地区与我国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因此，通过充分利用地理邻近优势开展贸易，不仅可以节省资源、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借此为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物质支撑。

二是主动打破传统的周边地缘政治单元界限，构建新的中外经济合作区。依据我国边缘地区的经济优势，结合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打造新的地缘经济单元区，通过推进一体化进程，形成不同的内外经济混合区。

三是努力将我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经济带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与缓和同美西方国家紧张关系的“缓冲带”。我们在重构地理单元时，不能仅仅以经济为单一考量，还要考虑其地缘政治、地缘军事甚至地缘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不仅要努力使得这种新构建起来的经济合作区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可持续力，而且要努力使其能够更长久地为我外交政策和战略服务。

## （三）关于范式与范式创新

范式（paradigm）概念最初由美国人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框架，同时还包括一批学者，他们不仅接受和信奉这种理论体系，而且还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该理论体系中提倡的理论观点、法则、定律以及工作方法来研究其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范式是理论和信奉该理论之学者的统一体。例如，美国国关学界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等主要范式，

其中前三个是美国国关理论建构的“三座大山”，同时也是其主流范式。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国内国关学界的范式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二是借用西方的三大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是“中国学派”，主要包括道义现实主义路径、共生学派、关系学派和天下体系论。尽管各派各有特色，但缺陷也较明显，例如：道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与西奥多·罗斯福的“胡萝卜加大棒”理论之间的区别不大；共生学派只讲美好共处，未能阐述如何实现这一前景；关系学派过于强调学理上的社会关系构建，实用性较弱一些；天下体系论实际上是将中国古代的“封贡体系”扩大到了整个世界，但不能令人信服地讲明这一目标如何才能实现。事实上，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国家的政策远远地将理论研究和创新甩在了后面，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与实践，等等，实际上都是出自职能部门或政策性智库，而不是中国国关理论界研究和创新的产物。这反映了我们的国关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实际需要。

鉴于此，在范式创新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大胆一些，不要怕被扣上“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论”的帽子，毕竟，我们历史上有过“封贡体系”和相应的“东亚秩序”，且都是通过软实力构建起来的，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所以，只有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理念下才能创新出真正有用的理论和范式，才能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和棱角，才能构建起我们自己的“理论高山”。

##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运用\*

余南平\*\*

在区域国别研究上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学界已经对此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讨论。2018年4月，王辑思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提出：“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项目批准号：20DZA099）的阶段性成果。

\*\* 余南平，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领军人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学科基础可以按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进行展开。”<sup>①</sup>担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的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以欧洲为切入点和案例，较为全面与详尽地阐述了区域国别研究中应该具有“地理范围”和“研究内容”全覆盖的学术追求，跨学科、深入实地田野调查的科研方法，以及掌握研究对象语言基础的必要学术素养。<sup>②</sup>暨南大学学者张云则根据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意义和研究问题导向提出了“理论、文化、治理和政策四个维度”。<sup>③</sup>通过进一步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对于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一个基本共识是必须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研究。但是根据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特点，在如何识别和应对复杂的区域和国别地缘政治变局问题上，特别是在对现实性、前瞻性强的“大战略”问题的判断上，<sup>④</sup>是否还存在一个通用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指导区域国别研究？须认识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体系与框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仍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充分的现实解释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互动关系基本原理，对于判断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行为，有着高屋建瓴的诠释效用和研判指示作用。因此，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将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学术范式的拓展。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应有的指导？这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超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范式解释的基础上进行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关

---

① 王辑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澎湃新闻，2020年10月3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2694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26941)

② 钱乘旦、胡莉：“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的‘欧洲研究’——关于欧洲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8-150页。

③ 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第85-95页。

④ 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国际关系领域战略分析，国内学者时殷弘在为美国“大战略”和冷战史研究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里程碑式的史书”《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撰写的“导读”中有精辟的论述。详见[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商务印书馆，时殷弘译，2019年，第v-xiv页。

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最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和财富占有视角看待生产力，认为“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至变成机器”<sup>①</sup>；“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sup>②</sup>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理论探究生产关系，人和自己的劳动活动、劳动产品、人类本质相异化，从而出现人与人相异化，占有这些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的人就是资本家，进而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同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分析：“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sup>③</sup>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意识到生产者主体，即人的作用，并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sup>④</sup>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且“人类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sup>⑤</sup>，进而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⑥</sup>在标识唯物史观成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包含众多经济学要素讨论，其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概述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能动的反作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化都和生产力的提

---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② 同上，第175-176页。

③ 同上，第532-533页。

④ 同上，第655页。

⑤ 同上，第613页。

⑥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升有着直接关联，生产力的提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全新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过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些主动与被动、基础与关系结构的解释，对于认识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均有指导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所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今天对于解释区域、国际互动与国别问题演化，较之其他流行理论都拥有更高级、更深层的洞察力。举例而言，在19世纪的国际经济学流派中，以德国历史学派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非主流的“国民经济学”，向以英国亚当·斯密为典型代表的主流“开放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流派发起了争论和挑战。而这种理论认识分歧的存在，如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特别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层面上看，英国强大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与帝国本土高效生产体系形成的“价值链闭环”，促使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意识到需要开放的全球市场与全球贸易；而德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则更需要经济基础积累而进行一定程度的产业保护。因此，斯密与李斯特之争，在现象上看是理论与研究方法本身正确性的讨论，而本质上是全球霸权强国与崛起后发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争，同时更是在物质决定意识作用下，一种观念性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化表达。同样，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生产关系”一般意义上的三个基本内容，即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地位、劳动产品分配关系，来对照今天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内涵的特征，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所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不同），如土地、原材料、资本、人力等，使得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上、中、下游的不同位置，承担高端或低端的不同角色（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地位），最终创造了不同的增加价值（劳动产品分配）。而这些“价值总和”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在当今经合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中就直接表现为“百万美元”形式的统计指标（价值）。而这样也就为区域和国别的问题找到了经济学领域实证主义要求下“科学研究”的基点，并能够解释当下区域总体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特点和区域内国家间互动的逻辑，乃至国家行为体的基准行为模式。

总结而言，如果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仅考虑和运用一般的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社会学在“现象”与社会“横切面”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和“研

究范式”，而无视甚至放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具有通用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不仅无助于对国际关系变化的本质把握，同时更容易在细节的论证上落入“数学模型自我构建”和“数据堆砌”的泥淖，抑或沉浸于个案描述和分析中夹带的自我价值观解释和文化抽象性描述。而这些均是区域国别研究中要谨慎对待并加以规避的。因此，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的现代性和时代性理解与运用，不仅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构建需要有足够的提炼，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问题综合研究，更是要回归、提炼、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进而对国际“大战略”形成的内在战略动因、战略行动能力、战略编码构成和战略行动结果，在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思维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 学术期刊在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与优势

石晨霞\*

当前，随着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对外交往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海外利益也持续拓展，加上“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对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全国很多高校、研究机构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建立了诸多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积极回应国家需要。与此同时，作为推动和引领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各类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期刊也积极作为，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展示与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外，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也使相应的学术期刊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从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科中各类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数量来看，已经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左右，研究的区域基本覆盖了世界主要地区和一些主要国家。近年来还新创刊了一些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包括《当代美国评论》《区域国别研究学刊》《区域与全球发展》等。这些既有的和新创的学术期刊共同助力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

---

\* 石晨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国际展望》责任编辑。

### （一）学术期刊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作用

首先，展示和传播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首要和直接的作用是展示和传播学术界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期刊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而言，其首要的作用也是及时将学术界、优秀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期刊的平台展示出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读者和决策者提供新的知识和方法。另外，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期刊的电子化也迅速推进，并借助一些新媒体、自媒体，使期刊内容的传播效率空前提高，进而有效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和影响范围，这也推动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新知识、新论断、新方法的传播和积累。

其次，发现优秀学者、培育学术新人。学术期刊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桥梁或中介，它是沟通研究者和读者之间的渠道，也是连接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当然，在学术界，研究者或知识的生产者往往同时也是读者和知识的消费者，这两个群体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和阶段可以互换。正是基于这种功能，学术期刊需要不断寻找优秀的研究者来匹配相应的研究议题，让某一领域最专业的研究者来研究其最擅长的问题，并将之展示出来。这个过程是期刊的主动作为，其需要掌握各研究领域学者的情况和研究议题的内容，从而实现最优匹配，这样才能保障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实现最优匹配的过程也是期刊或期刊人发现、挖掘优秀学者的过程。另外，学者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期刊在其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学术期刊往往都比较重视培育和扩大作者群，这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青年学者群的培育，而这些做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

再次，推动和引领学科发展。学术期刊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通过有针对性的选题策划来组织和推动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前沿性并能回应社会需求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另外，学术期刊也往往会通过举行学术研讨会来将相关领域的学者集中起来，对某一议题进行讨论，从而在不断交流中推进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推动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些活动和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 （二）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优势和特点

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综合性期刊相比，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有其自身的

优势和特点。

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具有持续性和系统性。这也源于其刊物定位与特点，长期聚焦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够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持续进行学术积累。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作者群相对比较稳定。稳定的作者群是学术期刊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专业性决定了这类期刊作者群的稳定性。当然，这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综合性期刊也会与国别区域研究期刊在稿源上产生竞争，因为好的国别或区域研究成果也是综合性期刊所需要的，这无疑会使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优质稿源受到一定影响。

再次，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具有鲜明的定位和特色是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与综合性期刊相比，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刊物定位、刊物特色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在此基础上，这些期刊可以在具体的领域中持续推进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逐渐确立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成为某一国别或区域研究的主要阵地。

###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作用**

结合当前国家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需要、这一学科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现状，未来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刊物的建设。

首先，坚持国别与区域特色。目前，随着各类学术期刊之间竞争的加剧，一些区域研究期刊的区域特色有所弱化，日益呈现出更加综合性的特点。这既有稿源的因素，也有各种评价指标的问题，使期刊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身的区域特色。事实上，期刊的特色与独特定位是其长远发展的基础，坚持自身的特色是重要且必要的。这需要平衡好长期发展与短期目标的关系、期刊评价指标与研究现实的矛盾等。因此，引导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坚持办刊特色、在自身的领域深耕细作，是繁荣和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评价指标有必要进行适度调整，这也是避免其偏离自身特色的重要保障。

其次，学术期刊要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也对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

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既要重视从多学科、跨学科的角度来组织稿件、培育作者，又要围绕某一国别或区域进行综合、全面、持续、深入的研究，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另外，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现状来看，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因此学术期刊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适度平衡，不能完全倒向政策研究。

再次，引导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均衡化发展。从目前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发文情况来看，对大国或重点国家、热点国家、热点地区的政策性研究相对较多，比如对美国、欧洲主要国家、日本、俄罗斯等的国别研究比较多。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这也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学科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但是随着我国对外交往范围和海外利益的扩展，与一些中小国家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因此加强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而且从学科的全面均衡发展来看，也需要平衡好大国研究与小国研究的关系，平衡好热点问题与冷门领域的关系。与此相应，学术期刊也需要培育多样化、多层次、均衡的作者群，这样才能引导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均衡化发展。

## 百年变局中要更加重视周边地区

王 健\*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变局中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周边地区研究。

从地缘政治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国崛起和稳固都离不开周边战略支撑。例如，美国崛起前，就通过争夺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武装干涉古巴独立运动、插手委内瑞拉危机等，全力经营周边。苏联在二战后也十分重视东欧地区的屏障作用。从全球化发展趋势看，以2007年为界，逐渐由“快速”转为“慢速”，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速由高于实际GDP年均增速2.1倍转为低于实际GDP增速，而“慢”下来的全球化一个比较显著的趋势就是地区化。2013-2017年区域内贸易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之比增加了2.7%，邻国市场效应日益明

---

\*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显，例如，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又如，亚洲区域内FDI占比达到了51.7%，表明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同时，从全球价值链扩大来看，在2011-2013年达到顶峰，增加值部分占到全球贸易额的四分之三，但近年来不再扩大。另外，中美关系紧张以及新冠疫情，使得“脱钩”成为一种战略安全考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越来越地区化、在地化。从科技发展的态势来看，一些新的技术和创新也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地区化发展，例如，机器人将减小人工成本在产业链布局中的影响，3D打印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新能源的发展使得对地缘外部依赖降低，而定制化的生产更加集聚消费地。因此，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和平崛起必须首先经营好周边地区，而中国周边环境不仅复杂程度是以往崛起大国中罕见的，还是大国博弈的前沿。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重塑期。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周边外交，首先需加强针对周边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最近几年，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等积极推动“周边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一些高校还专门建立了研究周边的机构，仅以上海为例，有复旦大学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的周边国家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今后要进一步聚焦，并发挥各地的地缘、文化、语言优势，深耕细作，培养出一批精通当地语言、熟悉历史文化、了解政治经济、拥有人脉网络的真正国别专家。

其次，要认真总结历史上我国经营周边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历史上的“封贡体系”，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周边安全、推进周边经济文化发展的功用，而且当时中国“以大事小”“以礼相待”。又如，明代前期的统治者对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所谓“臣而不治”，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的情形。在这一外交方略的指导下，明代前期与绝大部分周边国家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在周边外交中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点带面，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达成相关协议，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和边境划界问题。冷战结束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从相互信任措施开始，

不仅解决了边界问题，还由此创建了周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

再次，要加强和深化地区政治和安全机制建设，为周边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政治、安全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短板”，这不但制约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提升，还为地区外势力特别是美国插手周边局势、牵制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离岸平衡切入点。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抓住RCEP签署与合作抗疫的时机，以经促政，以非传统安全促传统安全合作。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爆发，都曾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转机和动力。目前，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进深发展，特别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增强安全合作功能；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系列峰会机制，进一步充实传统的“东盟10+3”“东盟10+1”机制，并体现更大的安全合作开放性；进一步扩展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推动亚信会议机制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管控好周边安全热点与涉华主权争端，在地区稳定与主权权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第四，将周边地区打造成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地区，构建产业链合作体系。中央明确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链的延伸、转型和升级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区域，通过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达成。数据表明，亚太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宽、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0%以上，其中中国为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为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14.7%），韩国为5000亿美元（占亚洲的6.3%）。特别是随着RCEP的签署，由于15个国家之间得以采用相同的原产地规则，将显著降低供应链延展至该区域的成本，有助于产业链在区域内部相对稳定而有序地转移，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率先构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依托、以中国为主导的产业链。

##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中东外交与中东研究推进刍议

余建华\*

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就已架起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和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桥梁。1949年新中国成立，揭开了中国与中东友好合作历史的新篇章，尤其是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开启了新中国的中东外交。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中东外交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1世纪以来，中东成为中国战略大周边的重要板块，中国中东外交态势进一步转向“有所作为”。而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地区国别研究组成部分，中国的中东研究也是伴随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跌宕起伏。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我国的中东研究迅速起步，其中中东政治研究出现短暂的“繁荣”。随后因“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国初创不久的中东研究陷于停滞。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与学术探索“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我国的中东研究也迎来了可喜的恢复与初步发展。21世纪以来，冷战后的中东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义不断增强，我国的中东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为：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丰硕，人才培养效果显著，智库作用得以发挥，国内外学术交流活跃，等等。

而在当今，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则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进一步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一个从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历程演进的新发展阶段，需要用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在外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仍在延续，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强，人类仍然面临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现实与潜在的严峻挑战。至于中东地区，正处于世界与地区两个大变局叠加激荡的动荡转型变

---

\* 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革进程。一方面，伴随外部大国美俄欧在中东力量消长变化，地区内部诸强围绕填补“后美国时代”权力真空，展开纵横捭阖的地缘政治角力，中东地区秩序处于从失衡到重构的动荡转型中，新老热点跌宕起伏，局势走向波谲云诡。另一方面，当今中东多国依然陷于“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政治乱局长波之中，在全球经济疲软、世界能源市场转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少中东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转型中社会政治尤其是民生治理的结构性顽疾痼症凸显，国家治理使命艰巨，经济发展成为摆脱国家困境的根本出路。

由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我们肩负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使命。中国外交不仅要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包括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还要服务于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就中国中东外交而言，一方面，这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全方位外交格局的重要一环，综合融汇了承前启后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大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多边和多领域外交诸多丰富内涵，必须服务于国家重大核心利益，需要中东国家在支持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继续发挥战略依托作用，成为中国有效防范“三股恶势力”渗透、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周边屏障，成为落实中国统筹国内外市场与资源、保障能源战略安全、促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国际场所。与此同时，经济与民生问题已成为制约中东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发展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总钥匙。中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的交汇地带与重点地区，共谋发展的目标决定中国与中东国家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与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些年来，中东诸国成为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践的重要伙伴，未来“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既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与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又要符合世界百年大变局与中东形势发展现实。另一方面，作为成长中的全球性负责任大国，中国必须在中东这样的全球重要地缘战略板块积极作为，不仅将其作为服务于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要国际舞台，而且要有建设性的使命担当，从总体超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将中国中东外交作

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区域实践与探索。因此，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需要保持与弘扬自身优势特色，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重点和行为方式，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包括在中东国际事务与地区热点的妥善处理与灵活应对。

相应地，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中东研究，既要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东的实践，又要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相协调。从推进中国中东研究更宽视野、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建设而言，当下中国的中东研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其一，从巴勒斯坦争端到叙利亚危机，中东一系列新老热点问题由来盘根错节、内涵错综复杂，关涉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生态、民族、宗教、安全与国际关系多领域，需要借鉴年鉴学派的启迪，开展多学科整合研究，尤其是将世界史与国际问题研究有机结合，重视长时段、中时段考察。其二，中东不仅是世界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发祥地，还是当代多元文明结合体，不仅要着力推进对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亚述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奥斯曼-土耳其文明和犹太文明等中东古今文明体的考察，而且要重视这些文明体与更大范围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地域意义上的地中海文明、印度洋文明和非洲文明之间交融碰撞的互动研究。这有助于更好把握当下与未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构。其三，要全面开展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研究。民族国家仍然是中东国际体系的最主要行为体，一战后百年来现代中东民族国家渐次独立后，始终没有跳出民族国家建设坎坷磨难的困境。相当意义上，十年来迄今未了的中东变局，乃是中东人民期望摆脱世界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滞后与边缘这一不利地位的困境突围。中东国家需要有效把握发展这一解决一切问题根源的钥匙。因此要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做好中东社会文化的考察，从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威权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到民族宗教与部落宗派问题等，这也有利于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治国理政的交流互鉴。

当然，中东研究还要坚持正确理论的引领、得当研究方法的运用，努力突破语言关，有效掌握各种相关翔实资料，理论联系实际，弘扬求真务实与经世致用的传统，积极开展多部门多层次国内外交流调研，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欧盟近年来对华政策转变的研究方法探讨

门 镜\*

中欧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组重要双边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欧在 2003 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是，近期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欧盟政策的不断转变，中欧关系遭遇严重挑战。本文尝试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从而在对欧关系中争取主动和积极应对。

首先，现实主义的解读。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欧盟对华的政策行为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主义特点。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行为者都必须自助。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行为者的力量分配。<sup>①</sup>而且，这些行为者之间缺乏信任，在竞争中形成彼此的地位。他们对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非常敏感，担忧相互依存的关系，强调独立的重要性。欧盟虽然已经与中国交往合作超过 45 年，但由于彼此之间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欧盟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尤其是近年来，欧盟的政治一体化遇到重大挑战，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再加上新冠病毒的肆虐，欧盟经历了各种危机，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投资大量增加，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债危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一带一路”进一步拉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虽然中国是新冠疫情最早的受害者，但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很快便遏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生产和生活秩序，与境外的混乱和无措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和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信心，使欧盟感到压力和担心。欧盟原本希望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改变中国的体制，但事与愿违。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选择了现实主义的竞争政策对抗中国。在经济上，限制中国对欧盟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限制华为在欧盟各国参与 5G 项目的推动，大幅增加在技术研发领域的预算，削减与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产品合作，试图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而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

---

\* 门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3, Vol.18, No.2, p.97.

与中国争夺技术领域的主导权。欧盟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美、日、澳、印等国家联手，逐步从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转向全面竞争。

第二，制度主义的解读。与此同时，欧盟又具有一些自由主义行为者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对制度作用的认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行制度，认为制度安排是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独立变量。<sup>①</sup>制度提出了国际体系中行为者相互认可的行为原则。它的合法地位要求行为者在其行为中考虑制度上的限制。与现实主义以战争冲突为解决方式的特点不同，新自由主义推动制度的建立和作用，希望通过制度约束增加透明度，从而避免战争。欧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是多边主义和机制安排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欧盟一体化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范，欧盟不可能走到今天。在欧盟对外的双边关系中，欧盟要求对方遵循欧盟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试图用对自己具有保护力的规则条款约束合作方的行为。在国际合作中，欧盟以其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为由，以多边主义为工作方法，要求其他国家配合，以便推广欧盟的价值观，实现自身的利益，并且在政治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但是，符合欧盟利益的制度并不见得符合其他方的利益。过去欧盟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欧盟近几年以维护市场公平、对等开放、增加透明度、加强法制、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名义制定新的战略和法规，试图给中国方面施压，通过制度安排迫使中国接受欧盟开出的各种条件。自由主义理论还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兵戎相见。<sup>②</sup>欧盟在其对华关系的文件中明确与中国是体制性竞争对手的同时，增加了与自身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各方面合作，并试图以此在政治和经济上抗衡中国的崛起。

第三，社会建构理论的解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物质结构的影响，取决于国家想要什么。行为者之间对彼此

---

①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2.

②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Majorities say China has handled COVID-19 outbreak poorly”, Pew Research Centre, Oct.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的看法和期望，而不是彼此间能力的分配，形成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哪种无政府状态将在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出现哪些特定身份和国家利益。行为者之间“发信号、解读和回应的过程完成了‘社会行为’，并开始了行为主体间相互认知的过程。”<sup>①</sup>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同时，建构主义理论还指出，行为者的身份认同是不断变化的、主观性的、与其他行为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sup>②</sup>在欧盟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欧盟成员国的对华认知也变得越来越负面。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底发布的最新问卷调查，反映了欧盟主要成员国对华认知态度的变化，令人关注。其中，德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02 年的 46% 下降到 2020 年的 25%，法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02 年的 58% 下降到 2020 年的 26%，英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02 年的 65% 下降到 2020 年的 22%。同时，德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 2002 年的 37% 上升到 2020 年的 71%，法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 2002 年的 42% 上升到 2020 年的 70%，英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 2002 年的 16% 上升到 2020 年的 74%。欧盟主要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来自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观判断，表现出对中国实力日益上升的担心，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猜忌。最近欧盟与中国之间因为人权事务的制裁与反制裁，使双方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张，欧盟越来越强硬。

中国与欧盟之间就“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动也可以用社会建构理论比较清楚地解读。当 2015 年中方首先提出与容克计划对接、双方合作建立互联互通平台的时候，欧盟方面不太清楚“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原则上表示愿意合作。但随着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进一步了解，越来越担心“一带一路”的构想与自身的互联互通理念不符，既在价值观上不同，也在实际利益方面有冲突。经过几次接触和互动，欧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希望以此独立于中方的“一带一路”设计，为欧亚互联互通的发展打上欧盟标签。

---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6.

② Peter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解读欧盟对华政策的近期变化, 只是一个粗浅的尝试, 目的在于理清欧盟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 找出欧盟政策调整的原因, 更好地估量欧盟政策变化给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 并从长远的角度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方向, 化被动为主动。

## 地区一体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尝试 ——以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例

臧术美\*

从十几年前开始, 个人就对国际关系理论与范式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对欧洲一体化主流理论之间的论争、混合与超越进行了深入探讨。<sup>①</sup>虽然这些主流理论之间存在相互渗透和借鉴, 但总体而言, 每一派理论都是各自为营、无法完全解释欧洲一体化这样复杂的现象, 而个人对欧洲一体化的疑问(欧洲一体化的本质与未来是什么), 也终究没有能够获得透彻明了的解答。于是, 抱着这个疑问, 又选取了欧盟地区政策这一重要而独特的政策作为研究对象, 以期能够从实践层面进一步解答自己的困惑。<sup>②</sup>上述这些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研究, 最终汇总到笔者 2020 年 12 月出版的专著《欧盟地区政策: 改革、效应与治理》当中(以下简称“专著”)。<sup>③</sup>在前后持续十多年的研究进程中, 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正好跟本次会议的主题——方法与范式的讨论紧密相关, 那就是“跨学科方法”的使用。

笔者对“跨学科方法”的感悟, 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个源于对现有理论与方法中“跨学科方法”的观察, 另一个是个人作为研究实践者对“跨学科”方法的具体运用。

从观察者的角度看, 举两个例子: 首先, 笔者注意到欧洲一体化主流理

---

\* 臧术美,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臧术美:《欧洲一体化主流理论的论争、混合与超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年。

② 博士论文法语版, Zang Shumei, *la Politique Régionale de l'Union européenne: Niveaux, Outils et Exemplarité?* Thès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Lyon (ENS Lyon); 博士论文中文版, 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改革与效应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

③ 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 改革、效应与治理》,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20 年。

论之间，既有论争，又有混合。欧洲一体化理论经历了三大论战：20世纪50-60年代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的论战，20世纪60-70年代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战，以及20世纪80-90年代至今理性主义阵营（解释性理论、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批判理论）阵营的论战。可以看到，论战的阵营之间，不断吸取对方的优点完善自身，体现出大量跨学科、跨范式方法的运用。其次，笔者在对欧盟地区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研究的时候，发现跨学科方法的使用也较为常见，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就体现出典型的跨学科特色。

从研究实践者的角度来讲，笔者的研究也尝试运用了许多“跨学科”的方法，包含历史学、（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

首先，笔者在专著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欧洲一体化“深化”与“扩大”之间的关系，主要运用的就是历史学（比如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长时段”）的视角。其次，专著第二部分在探讨欧盟地区政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时，主要采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一方面借用了欧盟官方评估所使用的三种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新地理经济学），另一方面对非官方的学者群体所使用的工具与评估结果进行了梳理。随后，专著第二部分还借用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对欧盟地区政策的地域效应进行了研究。<sup>①</sup>最后，在专著第三部分对欧盟地区政策的制度效应进行了详细探讨，主要从“地区化”进程（西欧与东欧比较）、“欧洲化”进程与“多层级治理”三个角度展开。对“多层级治理”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国内政治方法”与“比较政治学”。与此同时，笔者也曾经将这一“多层级”方法运用到“16+1”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研究中，并尝试提出了“中欧多层级合作机制”这一概念。<sup>②</sup>针对此次会议的主题“区域与国别研究”，想要跟各位同行请教和

---

① 也可以参考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经济、社会与地域效应研究”，《德国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臧术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一种多层级合作机制探析”，《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探讨的是，低于国家层面的“次区域”和“地方”层级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位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

结合上述研究实践，笔者对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提出以下几点感悟和思考。

首先，必要性。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是必要的。欧洲一体化本身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正如法国地理学家维奥莱特·雷伊（Violette Rey）在笔者专著序言中所提到的，“欧洲建设是一个不断在摸索中前进、永远无法完成、充满变化的创造性过程”。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就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学问，其研究对象也是极为复杂多变的，因此，需要大量“跨学科”方法的使用。

其次，可能性。“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和研究者个人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素养相关，没有统一的模式。

第三，利弊与困难。既要看到“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对于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和刻意使用，要注意到“学科”是“跨学科”的基础。只有研究者在一定的学科内部经过长时间的熏染，掌握了此学科的核心方法和理念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真正的“跨学科”。

第四，“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应始终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导下进行。可以采用“一句话表述问题”的方法来检验，即，请研究者只用一句话描绘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如果做不到，可能表明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

最后，法国“跨学科”方法的启示。笔者在法国里昂高师攻读博士学位时，对法国学界“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印象深刻。比如里昂高师（ENS Lyon）的Triangle实验室就是由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三大学科的学者联合设立的，而该校的东亚研究中心（IAO），在其日常运作和学术实践中也处处体现着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曾经提出的“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y）<sup>①</sup>和“综合性方法”，就是“跨学科”方法的典型体现。我们可以广泛借鉴西方学术界现有的跨学科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

①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

**【Abstract】** In May 2021,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together with others including *the Global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Deutschland-Studien* held an academic seminar entitled “Methodology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select manuscripts of some experts to form this proceeding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speeches from general theories to country-specific research cases). Currently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things in China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how to rational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ontemporary China is transitioning from “China of China” and “China of Asia”, described by Liang Qichao, to “China of the world”. Now it might be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Chines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are trying to develop a truly global vision (even including the North and South Pole, the outer space). In this process, “China of the world” urgently needs to establish 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system which can cover all geographic spaces of the world. Meanwhile,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ingly urgent need to “tell the world story well” according to China’s realities based o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The further a rising China is participating in world affairs, the greater the needs fo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will b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is duty-bound to provide related knowledge reserves.

**【Key Words】**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ual Circulation, N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мае 2021 год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Шанхай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едакция журнала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редакционн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журналов «Глобальный обз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ермании» совместно провел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семинар по теме «Метод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инновации парадигм в рамках новых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Мы выбрали рукописи некоторых выступавших экспертов, чтобы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для читателей данный выпуск письмен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х от общих теорий д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 конкретным страна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й). Теку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к. многое в Китае всегда было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как рационально понять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внешним миром. Нынешний Китай движется от «Китая Китая» и «Китая Азии», описанных Лян Цичао, к «Китаю мира». 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первый случай в истории,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лита попыталась создать поистин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видение Китая (включая Северный и Южный полюс, космос и т. д.).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мировой Китай» срочно нуждается в создании сист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знаний,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охватить вс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остр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рассказать историю о мире» Китаем на основе «рассказов о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ем глубж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участие Китая в мире, тем больше возника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интересе к и пониманию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мира. Как важная ча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Кита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обязаны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резервы знаний для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двойной цикл,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й

(责任编辑 崔 珩)